

# 世纪回眸

## ——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互关系认识的反思

孔寒冰

在行将逝去的20世纪里,无论中国还是世界,无论经济还是政治,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发生了以往一切世纪所没有过的巨大变化。就社会发展而言,20世纪唱主角的无疑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它们之间关系的阴晴圆缺是整个世界跌宕起伏的走向的主旋律,20世纪交响乐就是围绕着它逐步展开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主义”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不同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构成了20世纪这首交响乐的重要乐章。

所以,反思20世纪中国发展道路选择的时候,必须要回过头再看一看中国人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认识,再想一想中国在这方面的实践。这样做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按邓小平的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内涵,才能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以崭新的面貌走向即将到来的新世纪。

—

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这一类的词汇似乎注定是冷色调的,学者们无不以严肃端庄、正襟危坐,并且要么怀着尊崇的敬意要么以仇恨的心理来分析、来研究,其成果无论一本

一本的著作或一篇一篇的文章,仿佛从作者们身上克隆下来的,也都板着面孔,一幅极其严肃、极其认真的样子,干巴巴的像“木乃尹”或“猪排骨”。其实,生活是五颜六色、丰富多采的。写的人不妨脱下中山装,换上休闲服;读的人也大可不必过于紧张,只是在熟知的理论与历史中、在辛酸苦辣的回忆中、在不争的事实中去体味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去体味它们之间的关系到底应当什么样。

用轻松的口气来冲淡严肃的话题,从哪讲起呢?中国社会主义的曲折发展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曲折发展的一个缩影,也可以说是两制关系曲折发展的一个活标本。让我们就从中国曾经发生过的和正在发生的事例中来说明弄懂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的重要意义,说明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制关系有多么重要。

大约在70年代初期,有一部很有名的电影,叫《青松岭》,这是演员李仁堂的成名之作。故事发生在某省一个叫青松岭的小山村。车把式钱广脑子比较活,一门心思想“发家致富”。所以,每逢赶车进城的时候,他总是把自己的和左邻右舍的茄子、辣椒等家种蔬菜以及土特产捎上一些,偷偷卖点钱。正因如此,他家的生活也小有改善,回来后时常

\* 正值本文编排之际,杨淮生老师不幸病逝,谨以此文表示深切的悼念。

与老婆对饮几杯。

然而，钱广的这些做法引起村党支部书记万山大叔等人的愤慨，矛盾由此产生。在万山大叔的眼中，钱广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因为他发展的是自家的小生产，他做的是自己的小买卖、小生意，他富的是自己的小家庭。更可恶的是，钱广还滥用车把式的“特权”并引诱一些社会主义“觉悟不高”的农民跟他学。总之，钱广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要复辟资本主义。因而，万山大叔先做那些跟着钱广跑、觉悟不高的群众的思想工作，用自己给地主赶车落下的“老寒腿”现身说法，告诫他们不要走回头路，免得“再受二遍苦、再遭二茬罪”；然后，他又带领觉悟了的群众同钱广进行斗争，经过批评教育，钱广痛改前非，重新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影片的主题歌唱道：长鞭响那么一甩叭叭地响，赶起那大车出了庄；劈开重重雾，穿过那道道梁；要问大车哪里去，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向前方。

电影的情节并不复杂，但是将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它们之间那种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可是真正的结局呢？那是令人心酸的。这种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完全是基于一种无知的、纯朴的、盲从的情感，而毫无深沉的、理智的思考（坦白地说，处于封闭状态的农民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对此，只举一例便可知晓。在那个时代，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一句口头禅，可又有谁思考过这句话的内涵呢？所谓“辟”原指皇帝，“复辟”就是帝位的失而复得，转意为被推翻的阶级或集团卷土重来。所以，资本主义复辟理应是推翻的资本阶级重新占统治地位。然而，青松岭这个偏僻的小山村什么时候有过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呢？推而广之，除了个别国家，如民主德国之外，又有哪个社会主义国家有过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呢？作祟的主要是封建主义或其残余，它们披上社会主义外衣，便成了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那种“把无产阶

级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挥舞”的封建的社会主义。<sup>[1]</sup>

今天看来，相对而言，钱广由于经常赶车外出，见识稍多，当属比较开放人士之列；他搞的小生产也好，做点小生意也罢，并不是为了自己直接消费，而想拿到“市场”（当时往往是地下的或者非法的）上换点钱，然后再买些自己需要的消费品，当属“搞活经济”或“市场经济”的先驱者之列。然而，钱广被批判了、改邪归正了，重新走上了社会主义大道了。但在这些背后遭到“封杀”的是什么呢？说被“封杀”的是“开放搞活”过份不过份？进一步讲，万山大叔赶着的大车沿着所谓的“社会主义大道”到底能走到哪，路在何方？今天对于这些疑问的答案都是不言而喻的，可它们整整迷惑中国乃至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几十年！

电影是高于生活的艺术，但又确实实实在来源于生活，《青松岭》就是当时中国及其它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现实的缩影，甚至就是真实的写照。社会主义也好，资本主义也好，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好，在现实生活中都被人格化了，栩栩如生；万山大叔就是社会主义的化身，钱广是资本主义的化身，他们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 二

在中国“史无前例”时代，有一句“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也不栽资本主义的苗”的著名“豪言壮语”。其实，当时相类似的话语，在铁路有“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也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在厂矿有“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也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它们所表达的都是同一个意思：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仅是不兼容的，而且是绝对的、全方面的对立。

既然是绝对对立，那就应当彻底铲除资本主义，一点儿也不能留，于是在70年代初

达到登峰造极时就出现了反对“资产阶级法权”和“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其基本理论根据是毛泽东在1974年发表的一系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讲话。

10月20日，在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毛泽东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了。”<sup>[2]</sup>

12月26日在听取了关于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汇报后，毛泽东对周恩来、王洪文等人说：“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现在实行的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的书。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sup>[3]</sup>

根据老人家的钦定，商品制度、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八级工资制、物质利益、奖金、利润以及农村的个体小生产都属应加以限制并逐渐消灭的资本主义的范畴。在辽宁一个十分贫困的山区，生产队队长率领着社员将路边一块一块个人种的谷子连根拔掉，由于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栽资本主义的苗”和“割资本主义尾巴”这样奇特的信念和决心支撑着，他们在毁坏这些眼看就要成熟的谷物时竟然毫无吝惜之情。这不是天方夜谈，而是笔者在25年前亲眼看到的一幕，时间虽然过去这么久了，可还是如此清晰。

无独有偶。当时被誉为“欧洲一盏社会主义明灯”的阿尔巴尼亚，人口只有300多万，但“一手拿镐、一手拿枪”，在国土上建造了40多万座碉堡，其目的是“御敌于国门

之外”。外国人不准进入阿尔巴尼亚旅游观光，因为他们不是来自资本主义国家就是来自搞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国家，而社会主义国家的美丽风光“绝不能出卖给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分子来享受”。<sup>[4]</sup>

为了防止小生产、小生意滋生资本主义，辽宁出现了“赶社会主义大集”的“哈尔套经验”。1975年1月5日这一天，在辽宁省彰武县哈尔套公社的大街上，一辆高唱“革命歌曲”的宣传车开道，后面跟着浩浩荡荡赶集队伍。公社党委书记扛着半扇猪肉走在前面，书记的老伴领着戴红花、背着行李的女儿紧跟着，然后是公社党委副书记和另一名公社干部抬着一头猪，男女老少们有的抱着鸡，有的提着蛋，有的拎着菜，还有的扛着烧饭锅，总之，每个人手里必须拿点东西，人们敲着锣打着鼓，排着队，扭着秧歌，把手提肩扛的东西卖给国家。据当时发起者讲，这种大集解决的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

如此这般地兴社会主义、灭资本主义，如此这般地将它们对立起来，结果怎么样呢？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在其根据20多年采访经历写成的《邓小平时代》一书中写道：“1978年，全国8亿农民每人年平均收入仅有76元，其中2亿农民的年平均收入低于50元。当时农民年平均口粮不到300斤毛粮。还有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1978年，全国有1/3的地区生活水平不如50年代，有1/3的地区生活水平不如30年代。”农村这样，城镇呢？，仅以住房为例，“建国初期，天津人均住房面积3.8平方米，1972年，天津人均住房面积下降到3平方米。50年代初为工人修建的工棚式的临时住宅，一直住到80年代。”<sup>[5]</sup>1978年时，全国人均住房面积只有3.6平方米，比1952年的4.5平方米还低。从1953年到1993年，中国实行了四十年票证制度，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无一不凭票、不凭本。著名的思想家顾准60年代把这叫作“糊口经

济”，著名的作家张贤亮 90 年代则把它称之为“数字化生存”。<sup>[6]</sup>

草肯定不能当饭吃，非此即彼、二者必居其一的思维模式多么简单，多么肤浅！可这又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了社会主义在实践上出现曲折不是偶然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不是偶然的，中国进行改革开放更不是偶然的。据宫达非先生回忆，邓小平 1982 年讲：“看来世界社会主义，目前处于一个低潮时期，什么时候走出低谷很难说；这就要看我们中国了，苏联看来不行了。比如说再过 20 年或 30 年，或到 21 世纪的中期，中国人均分配 800~1000 美元或更多一些，到那个时候，社会主义在世界的形象也许会好起来……要大力抓经济建设，不解决贫穷问题，使国家真正富强起来，人民是不会拥护社会主义的。”<sup>[7]</sup>

### 三

有这样一个传说。老和尚为了有合格的接班人来继承衣钵，精心培养了一个小和尚，除了传授经法之外，还特别不让他接近女色，以净六根，以断尘缘。光是整日呆在高高的山上也就罢了，可是，终有一日，老和尚动不了，需要小和尚外出化缘。临下山时，老和尚叮嘱小和尚说：“一定要远离女人，因为她们都是老虎”。然而，下山后，小和尚很快就被年轻漂亮的姑娘吸引住了，发现女人非但不可怕，相反是那么可爱。返回山上寺庙后，小和尚告诉师傅：“不得了，老虎已经闯到我的心里了。”现在有一首流行歌曲好像就是根据这个传说改编的，名字叫《女人是老虎》。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领导人以及负责阐述这些领导人思想的学者们告诉人民：资本主义就是万分凶恶的老虎。于是，不论是什么，只要戴上资本主义这顶帽子，就立即变得张牙舞爪起来，谁

也不得接近。不过，应当看到，出现这种情况的基本前提就是封闭。钱广从暗地小本经营中尝到了甜头，所以发家致富即便是老虎，他也要搞；粮食不管是哪个“主义”的，都可以填饱肚子。所以，在社会主义世界，总有个别国家，在每个社会主义国家，总有个别人“偷吃禁果”，想借用一下已被事实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具体运作手段以便或者摆脱困境，或者快点发展自己。这种有悖于当时“主流”的行为被斥之为修正主义，不仅被革除教门，甚至被剥夺了生存的权利。批判修正主义是当代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中国 1957~1977 年二十年间社会生活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最先批判的是南斯拉夫。60 年代，中苏两党论战时，中国共产党曾发表了九篇评论苏共致全体党员公开信的文章，其中第三篇的题目为《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这篇文章称南斯拉夫为“现代修正主义”，所列举的理由，一是对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不是采取改造和消灭的政策，相反实行培植和发展私人经济的做法；二是在农村实行土地自由买卖和租赁、自由雇工和自由贸易，使得资本主义在农村大肆泛滥；三是取消了国家统一的计划经济，把利润作为刺激企业生产经营的根本手段，鼓励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把银行信贷作为竞争的杠杆，结果将社会主义全民经济蜕变为资本主义的私有经济；四是接受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援助，与它们发展经贸往来，开放市场和放弃国家对外贸的垄断，这样南斯拉夫就成了帝国主义的附庸。<sup>[8]</sup>

然后批判苏共和赫鲁晓夫。说苏共及其领导人是现代修正主义的原因，一是他们主张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可以长期和平共处，战争也可以防止；二是他们认为阶级斗争和阶级矛盾已经淡化，国家和共产党都成为全体人民的了；三是他们反对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四是在经济生活中，他们强调利润、物

质刺激和竞争等等。<sup>[9]</sup>

最后是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他们在中国推行“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罪状是搞“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唯生产力论”。<sup>[10]</sup>

批判本来的含义指的是对事物的分析和研究、做出评判，以说明其优点和不足。可是，这里的批判早已变种，成为对异己的人或事的声讨和谴责，目的除了以人多势众的方法来证明被批判者的错误与可恶，还在于追求一种心理上的快感，用“大观园里的丫环穿得再好，也是奴才”这种精神胜利法来自慰。

批判还有“杀鸡给猴看”的功能，以警示对此六根没净、尘缘未绝者，不要想入非非，只能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前进，任何其它道路都是歧途。

当然，被批判者也是批判者的参照物，是批判者常常用来照照自己的一面镜子。以史为鉴、以人为鉴，这是古训，理应遵从。可是问题是，由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没有搞清，修正主义这面镜子实际上成了一面哈哈镜。在它面前，歪曲的必然是照镜子者自己。胖子一照就成了瘦子，高个子一照就成了矮子，于是胖子忙不迭地增加体重，瘦子则慌慌张张地去减肥。所以，社会主义也就越发展越畸型，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就是这种畸型发展的必然结果，从深层次上看，中国社会各方面今天出现的种种问题也都是这种畸型发展的必然结果。

#### 四

上面讲的都是“忆苦”，我们还可以“思甜”。

国内外都公认这样一个事实：自1978年起，中国的命运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其标志就是这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可以从许多

角度来分析、研究改革开放，但就实质而言，改革开放就是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三个层次关系的再认识、再调整，将它们由过去的冤家对头变成了患难兄弟，由纵向替代变成了横向共存。还是用一些经济上的“第一”例子来说明吧！

先看改革。

1978年12月，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自发签订了全国第一份大包干合同书（“包干”、“合同”以前是姓资的）；

1980年6月18日，上海静安区工商局批准陈贵根开办了“文革”结束后第一家私营饭店（“私营”以前是姓资的）；

1984年，马胜利承包了石家庄造纸厂，成为全国第一个承包国营企业的人（“承包”以前是姓资的）；

1984年9月，中国第一个股份制公司——北京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股份制”以前是姓资的）；

1985年1月14日，上海职工谢海清购得“延中”股票50股，成为中国第一个股民（“股票”、“股民”以前是姓资的）；

1986年8月3日，沈阳防爆器械厂是全国第一个宣布破产的企业（“破产”以前是姓资的）；

1987年10月，中国第一个股份制企业集团——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企业集团”前是姓资的）；

1987年12月1日，中国第一家房地产交易市场在深圳成立（“房地产”、“交易”以前是姓资的）；

1990年11月26日，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在上海成立（“证券交易所”以前是姓资的）；

1992年10月8日，中国第一家国际商品期货交易公司在上海成立（“期货交易”以前是姓资的）。<sup>[11]</sup>

……

太多太多这样的第一，如今都已融入中

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流。在吸收的同时，一些以前绝对是姓社的经济范畴，如单一的公有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票证制度、平均主义的“大锅饭”、“铁饭碗”、福利分房、公费医疗等等，都已经或正在被改掉。

吸收的、抛弃的以及在此之后所形成的，不就是作为两制关系调整结果的改革吗？

再看开放。

1979年7月，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企业法》就像一把金钥匙，打开了对世界封闭了近30年的国门，也打破了“一无内债，二无外债”陈腐的思想禁区，昔日“夹着尾巴逃跑了”的“帝国主义分子”和“反动派”又纷纷夹着装有美元的皮包回到中国大陆，但不再是肆意的侵略，而是友好的投资。可以这样讲，中国20年改革开放这首交响乐是围绕着利用外资、建立涉外企业这个主旋律开展的。前外经贸部长吴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总结说：“从1979年到1997年11月底，我国已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302464家，合同金额5134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2166亿美元。已经开业投产的企业超过14.5万家，直接从业人员1750万人。1996年外商投资企业工业产值13280亿元人民币，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1992年的7.09%提高到13.33%。外商在华投资企业为我国增加了财政收入，提供了就业机会，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经济增长点，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牵动力之一。”<sup>[12]</sup>根据最新的资料“截止到1999年5月底，全国共批准外商投资企业331024家，合同外资金额55870.51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13.56亿美元。”<sup>[13]</sup>

除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外，外资还是促进中国体制转轨的催化剂、实现国家统一的纽带和走向世界的桥梁。中国已离不开外资了（当然，外资也需要中国），据专家测算，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中至少有两个

百分点是外资拉动的。然而，不要忘记，几乎所有的外资都是姓资的，即来自于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在每一笔外资、每一家涉外企业的背后，不正是中国与外国、大陆与港澳台之间的关系吗？不也是两制关系调整的结果吗？也正因如此，在中国全方位的以经济为重点的外交活动中，才有中美的“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中俄的“面向21世纪的战略伙伴关系”、中日的“面向21世纪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中英“合作伙伴关系”、中法“全面伙伴关系”等等。

一国两制，不同社会制度的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共有一个国家，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球两制，不同社会的国家，共有—个地球，相互依存，齐谋发展，这就是世界。

所有这些，又从正面说明，正确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应当如何会有怎样的积极结果。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不是这种积极成果吗？

## 五

上面没加详细分析、论证的例子无非是要说明，正确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以及正确处理好它们之间关系的重要性。也许有人会说，那些都是过去的事了，而今谁还讲这些呢。

其实不然，树欲静而风不止，更何况思想也好、体制也好都有很大的历史惯性，1998年围绕着马立诚、凌志军写的《交锋》一书展开的争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sup>[14]</sup>还有，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并非只是积极效应，负面效应也是明摆着的。比如，大量的外资和众多的涉外企业对国内企业、国内市场 and 国有品牌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于是就引起了近几年关于引进外资是好事还是坏事，引进外资多了还是少了，是中国利用外资还

是外资利用中国，对外开放到底是招来凤凰还是引狼入室等等争论。<sup>[15]</sup>

在中国这个意识形态传统比较浓厚的国度里，任何争论的不同结局都会给社会发展带来不同的结果。

在有的情况下，争论的各方对争论的对象并不清楚，属于“瞎攀”，比如，前面谈到的“资本主义复辟”问题。

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尤其在社会剧烈变动的转轨时期，争论属于新旧思想的交锋。社会的进步首先是从思想解放开始的。没有启蒙运动，就不会有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

中国正处在从传统的体制向一种新的体制转变过程中，新旧思想交锋的焦点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所谓姓资姓社问题。两制关系问题不搞清楚，势必影响中国的转轨进程。

如何才能深刻地认清今天和明确地展望明天呢？或者说使正确的观点在争论中获胜并在实践中成为指南呢？必须正确地总结昨天。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制关系的理论和实践上，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有太多太多的经验和教训，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之后，这些经验和教训也不能不算作一笔不小的财富。

然而，总结过去必须站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的高度，目的也必须是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总之，必须是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如果仅仅是重复、赞美某些理论并用它们来指责现在，如果仅仅是沉溺在某个时期的历史辉煌中并用它们来对比现在。那么，这样的总结比不总结还坏。

总结必须是反思的，从自身找出成功与失败的原因、经验和教训。为什么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会出现今天看来几乎不可思议的过程？其深刻的思想上的、历史上的、经济上的和政治上的原因在哪儿呢？对这些再作进一步地理论分析非本文所能容纳，这里就暂且不谈了。但要指出的是，千万别光强调外

因，千万别忘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就是内因是变化的根本，外因是变化的条件。

总结还必须是批判的，对已有的理论和实践作出自己的判断，说明它们正确在哪儿，错误在哪儿以及为什么正确或不正确，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见解，来真正发展某一种理论或推动某一种实践。

总结、反思、批判就是照镜子、整衣冠。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制关系这面历史镜子必须是干干净净的，这样照过并整理后的社会主义形像才能是整整齐齐的，以饱满的热情、无限的生机走向 21 世纪，以图再度辉煌。

把总结当作抹布，以去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制关系这面历史镜子上的各种污渍为使命。但是，也许有的污渍太久了擦不掉，也许这片抹布本身也有不干净的地方，但无论如何总会有些功效的。对此，我毫不怀疑。

(1999 年 8 月 18 日)

注释：

- [1] 《共产党宣言》，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年中文版，第 78 页。
- [2] 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文化大革命”时期）》（27），第 221 页。
- [3] 同上。
- [4] 参见 [南] 米伦科·巴比奇等著：《恩维尔·霍查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出版社 1984 年中文版，第 5~16 页。
- [5] 杨继绳：《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纪实》上卷，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8、22 页。
- [6] 参见顾准著：《顾准日记》，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08—109 页；张贤亮著：《小说中国》，经济日报出版社、陕西旅游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6—11 页。
- [7] 宫达非主编：《中国著名学者苏联剧变新探》，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 页。
- [8] 参见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

- [9] 参见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苏修“经济改革”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5年中文版，第1—16页。
- [10] 参见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胜利万岁》，陕西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299—307页。
- [11] 参见《厂长经理日报》，1998年12月5日。
- [12] 李争平：《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外经贸部部长吴仪访谈录》，《经济日报》1998年1月20日。
- [13] 《人民日报》1999年6月25日。
- [14] 参见马立诚、凌志军：《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批判此书的文章见《当代思潮》1998年第6期。
- [15] 有关这方面的争论，参见拙著《涉外企业的理论与实践》，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37—40页。

(上接第93页)

注释：

- [1] 路透社巴黎1998年12月9日电。
- [2] Oddbjørn Knutsen, "Expert Judgement of Left-Right Loca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 A Comparative Longitudinal Study", see *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 21, No. 2 (April 1998), pp. 63-94.
- [3] Ibid.
- [4] 安·吉登斯：《超越左与右》，载《共决杂志》，1997年，第18页。
- [5] 雷金纳德·戴尔：《“第三条道路”理论的某些陷阱》，载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1998年10月2日。
- [6] 法国中文报纸《欧洲日报》，1998年10月3日。
- [7] 见《亚洲周刊》，1998年10月5日。
- [8] 参阅阎小冰、邝杨：《欧洲议会：对世界上第一个跨国议会的概述和探讨》，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1月版。
- [9] 冈泽宪美：《政党》，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185页。
- [10] 同注[8]。
- [11] 《变化中的欧洲政党》，见日本《朝日新闻》，1998年12月3日。
- [12] Simon Hix and Christopher Lord,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European Uni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97, p. 198.